

## 告欧洲人书<sup>①</sup>

以前任何一次战争都没有象现在这样完全破坏文化合作。而这次战争恰恰又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候：技术和交通的进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需要有国际交往，而这种关系必将走向普遍的、全世界的文明。也许正由于以前存在着那么多的国际间的纽带，当我们看到了这种关系的断绝，就更加伤心，更加痛苦。

我们一点也不能被弄得惊惶失措。凡是对共同的世界文化稍为关心的人，现在都有双倍的责任，为维护这种文化所必须引为依据的那些原则而起来斗争。然而，那些本来可指望具有这种思想感情的人——主要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到目前为止的反应，几乎使人看来，他们好象已经放弃了任何还想维持国际交往的愿望。

① 这个宣言是由 G. F. 尼可拉(Georg Friedrich Nicolai)于1914年10月中旬起草的，在上面签名的只有4人，爱因斯坦也在内，并且是它的最积极的支持者。这个宣言当时因签名的人太少，没有正式发表。以后尼可拉在自己所著的《战争的生物学》一书(*Die Biologie des Krieges*, 1916年在瑞士出版)中把它附带发表了。这个宣言虽然不是爱因斯坦写的，但同他一生的政治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又考虑到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个签署的政治宣言，所以也把它选编在这个集子里。这里译自奥托·那坦(Otto Nathan)和海因茨·诺尔登(Heinz Norden)编的《爱因斯坦论和平》(*Einstein on Peace*)，1960年纽约Simon and Schuster出版，第4—6页。

据《爱因斯坦论和平》编者按：自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文化界在军国主义分子操纵下，于1914年10月初发表一个为德国侵略暴行辩护的宣言《文明世界的宣言》。在上面签名的有93个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教师等。《告欧洲人书》是同它针锋相对的，签名的除了尼可拉和爱因斯坦，另外就只二人：一位是年过八十的柏林天文台台长菲斯特(Wilhelm Förster)，他悔恨自己在93人的宣言上签了名；另一位是比克(Otto Buck)，他以后在阿根廷一家报社里当记者。尼可拉当时任柏林大学生理学教授，以后志愿参加陆军军医工作，1918年6月乘飞机从德国逃到丹麦。——编者注

他们以敌对的精神来讲话，而没有站出来为和平说话。民族主义的热情不能为这种态度辩解，这种态度同这个世界上从来被称为文化的那些东西是不相称的。如果这种精神在知识分子中间普遍流行，那将是一种严重的幸。我们深信它不仅会威胁文化本身，同时还会危及民族的生存，而这次野蛮的战争也正是以保卫民族生存为借口而发动起来的。

技术已经缩小了这个世界。的确，今天大欧罗巴半岛各国相互挤撞的情况似乎很象以前挤进那几个伸向地中海的较小半岛上的各个城邦那样。旅行是那么普及，国际间的供求那么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欧洲——几乎可以说整个世界——甚至现在就已成为一体。

必须防止欧洲由于缺乏国际组织而重蹈古代希腊的覆辙！毫无疑问，有教养的和好心肠的欧洲人至少有责任去作这样的努力。要不然，难道让欧洲也因兄弟阋墙，逐渐筋疲力竭而同归于尽吗？

目前正在蔓延开的战火是很难产生“胜利者”的；所有参加战争的国家很可能都将付出极高的代价。因此，一切国家里有教养的人都要尽力去争取这样一种和平条约，这种条约不管目前冲突的结果如何，将都不会撒下未来战争的种子；这样的努力显然不仅是明智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必须利用由这次战争所造成的欧洲不稳定和动荡的局势，把这个大陆熔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促成这种发展的条件，无论在技术上和文化上都已成熟。

这里不是讨论怎样可以达到这种欧洲新秩序的场所。我们唯一的目的是申明我们这样一个深切的信念：欧洲必须联合起来保卫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这个时机已经到来。我们公开声明我们关于欧洲统一的信念，这个信念我们相信是为许多人所共有的；我们希望这样公开声明我们的信念，会促进一个声势浩大

的欧洲统一运动的发展。

朝着这个方向走的第一步，应当是一切真正爱护欧洲文化的人——一切曾经为歌德所预言为“善良的欧洲人”的人们——团结起来。

我们不当放弃这样的希望：他们的一致呼声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可以高过武装冲突的喧嚣，尤其是如果那些已享有声望和权威的人也共同来呼吁。

我们再重复一句，第一步是欧洲人团结起来。如果象我们所热忧希望的，在欧洲能找到足够多的欧洲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事业，而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称——我们就将努力去组织欧洲人联盟。到那时，这个联盟可以发出号召，并采取行动。

我们自己所探索的不过是行动的第一步，就是发出这个挑战书。如果您同我们一条心，如果您也决心为欧洲的统一开创一个广泛的运动，那末就请您签上自己的名字吧。

## 给罗曼·罗兰的信<sup>①</sup>

通过报纸，并且通过我同那坚贞不渝的“新祖国同盟”<sup>②</sup>的联系，我知道了您是何等勇敢地、全心全意地为消除法德两国人民之间可悲的隔阂而献身。我热诚地向您表达我的深切的钦佩和敬意。但愿您的光辉范例会激励别的品格高尚的人，使他们放弃那些难以理解的妄想，这种妄想象恶性瘟疫一样，使那些在别的方面是聪明、能干而敏感的人也受到了传染。

当我们后代子孙讲到欧洲的成就时，难道我们能让他们说，三个世纪文化上的艰辛努力，只不过是使我们从宗教的狂热走向民族主义的疯狂，而没有再前进一步吗？在双方的交战集团里，今天甚至连学者们的所作所为也都好象是在八个月前突然失去了头脑一样。

如果由于我现在的住所，或者由于我同德国国内外科科学家的联系，你认为我能为你效劳，那末我将尽力去完成您所吩咐的任何工作。<sup>③</sup>

① 这是爱因斯坦于1915年3月22日从柏林写给当时住在瑞士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信。这信最初发表在A.利夫(Alfred Lief)编的爱因斯坦文集《反战斗争》(The Fight against War, 1933年纽约John Day公司出版)上。这里译自《爱因斯坦论和平》第13页。标题是我们加的。——编译者

② “新祖国同盟”(Bund Neues Vaterland)是1914年9月在柏林成立的一个反战团体，爱因斯坦是它的创始人之一。1916年2月这个组织被禁后处于地下。1922年以后改组为“德国保卫人权同盟”。——编译者

③ 1915年3月28日罗曼·罗兰立即写了一封热情的回信。半年以后(1915年9月16日)，爱因斯坦特地到瑞士斐维(Vevey)去看罗曼·罗兰。这是他们第一次会见，两人热情地谈了两个半天。关于这次谈话，罗曼·罗兰在日记上有详细记载。这篇日记已于1952年在法国的一家杂志上发表。《爱因斯坦论和平》一书中也译载了很长的几段。——编译者

## 学者唯一的“祖国”

——1915年8月23日给P.埃伦  
菲斯特的信<sup>①</sup>

我向洛伦兹(Lorentz)提出的建议<sup>②</sup>是天真的。那是冲动胜过见识。我多么想把处于不同“祖国”的同行们团结在一起。这个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小集体不就是值得象我们这样的人去认真关怀的唯一的“祖国”吗？难道他们的信念竟要仅仅取决于国境这一偶然条件吗？

---

① 这是爱因斯坦写给他的挚友保耳·埃伦菲斯特(Paul Ehrenfest)的信。埃伦菲斯特当时在荷兰莱顿大学任教，关于他的情况，请参阅本文集第一卷324—327页。这里译自《爱因斯坦论和平》12页。标题是我们加的。——编者

② 据《爱因斯坦论和平》编者按，1915年4月“荷兰反战委员会”在海牙召开一次促进持久和平的国际会议，谋划由荷兰政府出面斡旋停战。当会议消息向德国报纸透露时，德国外交部表示拒绝这一计划。大约在海牙会议期间，爱因斯坦向荷兰著名物理学家H. A. 洛伦兹提出一个建议，建议的具体内容不详，可能是动员中立国科学家参加海牙的和平活动。这一建议遭到洛伦兹拒绝。——编者

## 欢呼德国 1918 年 11 月革命

——1918 年 11 月 11 日给母亲的  
两张明信片<sup>①</sup>

### 一

伟大的事变发生了！我原先还害怕法律和秩序会完全崩溃。但到目前为止，运动正以真正壮丽的形式发展着，这是可能想象到的最惊心动魄的经历。最难能可贵的是人民竟会那么毫不迟疑地欣然接受了它。能亲身经受这样一种经历，是何等的荣幸！为了酬谢那么辉煌的成就，无论怎样严重的崩溃，人们都不会不乐意忍受。军国主义和官僚政治在这里都已被铲除得一干二净。

### 二

请您不必担心；到目前为止，事事都很顺利——一切实在都动人心弦。现在的领导看来同它的任务完全相称。事态的发展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只有现在，我在这里才开始感到心安理得。〔战争的〕失败创造了奇迹。学术界把我看作是一个极端社会主义者。

---

<sup>①</sup> 这是爱因斯坦 1918 年 11 月 11 日从柏林写给他母亲的母亲的 两张明信片。这里译自《爱因斯坦论和平》24 页。标题是我们加的。

按：在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1918 年 11 月初德国爆发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起义，11 月 9 日德皇威廉二世在革命群众的强大压力下退位，“德意志共和国”（即以后所称的“魏玛共和国”）宣告成立。1918 年 11 月 11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编者注

## 在国会大厦对柏林大学 学生的讲话<sup>①</sup>

同志们：

请允许象我这样一个不是最近才转变而是老早就信仰民主的人讲几句话：

我们的共同目的是民主，是人民的统治。只有当个人信守不渝地坚持下面两件事，这个目的才能达到：

首先，应当甘心情愿地服从人民的意志，象在选举中所表现的那样，即使在多数人同自己个人的愿望和判断相抵触时，也应当如此。

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到目前为止取得了些什么结果呢？还应当做些什么呢？

阶级统治的旧社会已被推翻。那是由于它自身的罪恶，并且通过士兵的解放行动而土崩瓦解的。士兵迅速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同工人委员会取得一致的行动，在目前应当公认它们是群众意志的代表机构。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要无条件地服从它们，并且应当尽我们一切力量来支持它们。

<sup>①</sup> 这是爱因斯坦于 1918 年底所作的讲话，见《爱因斯坦论和平》25—26 页。标题是我们加的。

据《爱因斯坦论和平》编者按：1918 年底柏林大学激进的学生“罢免”了他们的校长，并且坚持其他改革。爱因斯坦因他的超然的和温和的态度，受到学生欢迎，被请去进行调解。当时学生在国会大厦开会，爱因斯坦同玻恩（Max Born）和另一位同事（即心理学家麦克斯·韦特海姆（Max Wertheim））前去参加他们的集会。手稿最后两段打了很轻的×号，可能在讲话时是没有讲的。——编译者

其次，一切真正的民主主义者都应当提防不让左翼的新的阶级暴政来代替右翼的旧的阶级暴政。不要让复仇的情绪把我们引诱到这样一种致命的观点：以为暴行必须用暴行来对付；以为要把自由的概念灌输给我们的同胞，就必须暂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暴力只能产生痛苦、仇恨和反抗。<sup>①</sup>

因此，我们必须无条件地要求现在的专政政府——它的命令我们应当自觉遵守——不考虑党派的利益，立即筹备制宪会议的选举，从而尽快地消除一切对新暴政的恐惧。只有在这种制宪会议召开了并且满意地完成了它的任务以后——只有在那个时候，德国人民才能够为他们自己赢得了自由而自豪。

我们现在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应当受到我们全心全意的拥护。他们深信自己理想的力量，已经公开表示赞成召开制宪会议。这样，他们就表明他们是尊重民主的理想的。愿他们胜利地领导我们从严重的困难中摆脱出来，而这些困难都是以前的统治者的罪恶和无能所扔给我们的。

---

<sup>①</sup> 爱因斯坦虽然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准备在另外的场合进行分析批判。——编者



---

---

## 我尊敬列宁<sup>①</sup>

我尊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的人。我并不认为他的方法是切合实际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象他这种类型的人,是人类良心的维护者和再造者。

---

① 译自安东·赖塞(Anton Reiser):《爱因斯坦传》(*Albert Einstein, A Biographical Portrait*),纽约Boni公司出版,1930年,141页。标题是我们加的。估计爱因斯坦写这段话的时间大概在1918年。

按:“安东·赖塞”是爱因斯坦的女婿鲁道夫·凯泽尔(Rudolph Kayser)的笔名。这本传记是在爱因斯坦同意之下写成的,爱因斯坦在序言中认为它“从头至尾所讲的事情都是相当确凿的”。但爱因斯坦只允许这本传记用英文出一版,不许再版,也不允许它用德文出版。——编者

## 约瑟夫·泡培尔-林卡乌斯<sup>①</sup>

泡培尔-林卡乌斯不仅是一位有才华的工程师和作家。他还是少数体现时代良心的出色人物之一。他孜孜不倦地向我们宣传社会要对每个人的命运负责，并且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把社会应尽的义务变成事实的道路。社会或者国家不是他盲目崇拜的对象；他把社会要求个人作出牺牲的权力，完全建立在社会应当给个人的个性以和谐发展机会这一责任之上。

---

<sup>①</sup> 泡培尔-林卡乌斯(Joseph Popper-Lynkaeus, 1838—1921)奥地利人，他的原名是约瑟夫·泡培尔(Joseph Popper)，“林卡乌斯”(Lynkaeus)是笔名。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写过很多尖锐批判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著作，有些书被当时的奥匈帝国列为禁书。他的哲学思想接近于马赫，社会理想接近于空想社会主义。爱因斯坦这篇文章大概是在 1921 年为悼念他逝世而写的。这里译自《思想和见解》67·68 页。——编者

## 我对美国的最初印象<sup>①</sup>

我必须履行我的诺言，讲一点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这对我来说，完全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当一个人受到象我在美国所受到的那样好意和不敢当的盛情款待，就不容易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的态度。首先就让我来谈谈这方面的事。

在我看来，个人崇拜总是没有道理的。固然，大自然在她的儿女中间并不是平均地分配她的赐物；但是，多谢上帝，得到优厚天赋的人是很多的，而我深信，他们多数过的是淡泊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要在这些人中间挑出几个，加以无止境的赞颂，认为他们的思想和品质具有超人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甚至是低级趣味的。这就是我所经历过的命运，把公众对我的能力和成就的估计同实际情况作个对照，简直怪诞得可笑。意识到这种离奇的情况，就会无法容忍，但有一点却也令人感到欣慰：在这个被大家斥责为物欲主义<sup>②</sup>的时代，居然还把那些一生目标完全放在知识和道德领域中的人看作是英雄，这该是一个可喜的迹象。这证明，大多数人是把知识和正义看得比财产和权力更高。我的经验告诉我，这种理想主义<sup>③</sup>的观点在美国特别流行，而美国是被诋毁为一

<sup>①</sup> 爱因斯坦于1921年3—5月间第一次访问美国回到德国后，向荷兰《新鹿特丹信使报》(Nieuwe Rotterdamse Courant)记者谈了访美的观感。这个谈话记录全文最初发表在1921年7月7日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1921年7月31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曾部分转载。这里译自《思想和见解》3—7页，是这个谈话的一部分。标题也是照《思想和见解》中所用的。——编译者

<sup>②</sup>，<sup>③</sup> 这里的“物欲主义”，也可译作“实利主义”，德文是 *Materialismus*，英文是

个非常物欲主义的国家。讲了这番题外插话之后，我得言归正传，并且希望读者对我这些朴素的议论不要过分重视。

使访问者首先感到惊叹的是这个国家在生产技术和组织方面的高超。同欧洲相比，日常用品比较结实，房屋设计也实用得多。每件东西都设计得尽量节省人力。劳动力是高昂的，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口同它的自然资源相比还是稀疏的。劳动力的高价刺激了技术装备和工作方法的惊人发展。人口过多的中国和印度显示了一个相反的极端，在那里，劳动力的廉价妨碍了机器的发展。欧洲则处于两个极端之间。机器一经充分发展起来，它终于比最廉价的劳动力还要廉价。欧州的法西斯分子应该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出于狭隘的政治偏见，总是盼望他们自己的国家有更多的人口。可是，美国却忧心忡忡地用过高的税率来排斥外国的商品，这同一般的景象无疑形成了古怪的对照。……但是不可指望一个天真的访问者去过多地绞脑汁，而且要对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合理的答案，那毕竟也是完全没有把握的。

感动访问者的第二件事，是愉快而积极的生活态度。在照像上表现出来的人们脸上的笑容，象征着美国人的最大财富的一个方面。他们是友好的，自信的，乐观的——又没有妒忌心。欧洲人发现同美国人交往是轻松愉快的。

---

*Materialism*，同哲学上的“唯物论”是同一个词，但两者意义完全不同，可是许多资产阶级学者故意把两者混为一谈，企图由此来破坏唯物论的声誉。这里的“理想主义”，德文是 *Idealismus*，英文是 *idealism*，同哲学上的“唯心论”是同一个词，两者的意义也完全不同。事实上，由于历史上唯物论一般是代表新兴革命阶级的哲学，唯心论代表没落反动阶级的哲学，所以，哲学上的唯物论者多半是理想主义的，而唯心论者则多半是物欲主义者。在爱因斯坦的著作中，哲学上的唯物论这个名称是用“实在论”(*Realismus*)来代替的。——编译者

比起美国人来，欧洲人比较爱发议论，比较怕难为情，比较缺少同情人和帮助人的心肠，比较孤独，在娱乐和阅读方面比较爱挑剔，一般说来，多少有点悲观主义的味道。

美国人非常重视物质生活的享受，使得宁静、闲适、安全统统为此牺牲。美国人比欧洲人还更加为他们的目标，为未来而生活。生活对于他们总是在流动不息的，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就这方面来说，比起欧洲人来，他们同俄国人和亚洲人那就相去更远。

但是有一个方面，他们却比欧洲人更接近于亚洲人：他们的个人主义比欧洲人少——那是从心理的观点来看，而不是从经济的观点来看。

他们比较强调的是“我们”，而不是“我”。作为它的一个自然结果，风俗习惯极为强有力，因而，美国人中间的人生观、道德观和审美观，比起欧洲人都要一致得多。这件事是美国经济之所以胜过欧洲的主要原因。无论在工厂里，大学里，或者在私人的慈善机关里，合作和分工的发展都比欧洲容易，相互的摩擦也比较小。这种社会意识很可能部分来自英国的传统。

同这一点显然矛盾的是，比起欧洲来，美国国家的活动相对的受到了限制。当欧洲人发现电报、电话、铁路和学校大部分竟都掌握在私人手里，他会感到惊讶。我刚才提到的个人有较强的社会态度，使这件事在这里成为可能。这种态度的另一后果是，财产分配的极端不平均并没有引起无法容忍的苦难。富裕阶层的社会意识比在欧洲的要发达得多。有钱的人认为把他的财产的很大部分，而且常常连同他自己精力的很大部分，交给社会去支配，是自己理所当然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个威力无限的社会舆论也迫切要他这样做。因此，最重要的文化职能能够留给私营企业去行使，而政府在这个国家里所起的作用相比之下就很有有限了。

政府的威信无疑地已由《禁酒法》<sup>①</sup>而大大降低了。因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法律的尊严所受到的损害，再没有比通过一些行不通的法律更为严重了。在这个国家里，犯罪案件危急地增加，同这件事就有密切的关系，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在我看来，禁酒还从另一个方面损害了政府的威信。酒店原是一种使人民有机会对公共事务交换看法和意见的场所。就我所见，在这个国家里正是缺少这样一种机会，结果就使报纸对社会舆论产生了过分的影响，而报纸多数是由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的。

在这个国家里，对钱财的过分重视比在欧洲还要厉害，但我看来，这已在减弱。人们终于开始体会到，巨大的财富对愉快和如意的生活并不是必需的。

关于艺术方面，在现代建筑和日常用品上所显示出来的美好的风格真正地感染了我；另一方面，同欧洲相比，观赏艺术和音乐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却很微不足道。

我对美国科学研究所的成就感到十分钦佩。要是我们企图把美国科学研究工作日益增长的优势完全归功于充足的经费，那是不公正的；专心致志，坚韧忍耐，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的才能，在它的科学成就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临结尾，还要再讲一点观感。美国在今天世界上技术先进国家中间是最强大的，它对于决定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是绝对不可估量的。美国是一个大国，可是它的人民至今对于重大的国际问题还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而在今天裁军问题在国际问题中占着首位。即使仅仅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着想，这种情况也必须改变。上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各个大陆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屏障，一

<sup>①</sup> 美国国会于1919年通过《禁酒法》，因行不通，1933年又不得不宣布撤销。  
——编者

---

切国家的命运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美国人民必须明白，他们在国际政治领域里负有重大责任。袖手旁观者的角色，同这个国家是不相称的，而且到头来必然要导致世界性的灾难。

## 科学家和爱国主义<sup>①</sup>

战争对国际合作的发展是最可怕的障碍，尤其在于它对文化的影响。战争破坏了知识分子从事创造性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条件。如果他正好是年轻力壮，他的能力就会被束缚在破坏性的战争机器上，而年纪大的人也会陷进仇恨和失望的气氛之中。而且，战争导致国家贫困，导致长期的经济萧条。所以，凡是珍惜文化价值的人，就不会不成为和平主义者。

科学同和平主义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呢？显然，纯粹科学对于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是些微的。在那个首先应当被考虑的科学工作领域——即历史科学——中，大多数代表人物对于促进和平主义事业实在没有做过什么。事实上却有许多历史学家，虽然不是最好的历史学家，特别在大战期间，卖力地鼓吹粗暴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

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自然科学家容易接受和平主义的目标，那是因为他所处理的题材具有普遍的特征，使他必须依靠国际合作。经济学家也是这样。他们必然会认为战争对于经济有一种破坏瓦解的作用。

可是在科学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中，使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在于科学的物质作用，而不在于它对人们思想的作用。从科学家工

<sup>①</sup> 原文最初发表在1922年柏林出版的由伦茨(Kurtz Lenz)和法比安(Walter Fabian)编的和平主义手册《和平运动》(Die Friedensbewegung)。这里译自《爱因斯坦论和平》54—55页和《反战斗争》17—18页。标题是根据《反战斗争》中所用的。——编者



作中产生出来的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全世界的经济相互依赖:这就是每次战争之所以都对全世界有重大影响的缘故。只有当我们对这种发展的重大意义有了充分了解,我们才能集中一切必要的精力和好意,来创立一个组织,使战争完全成为不可能。